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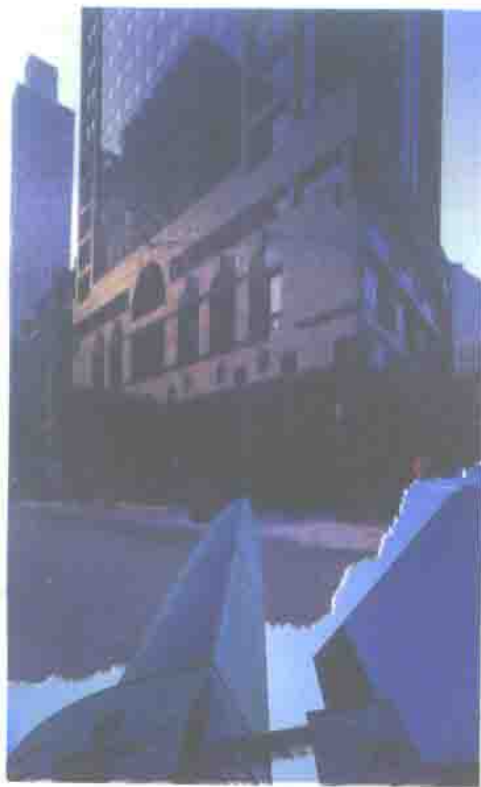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罗荣渠——主编

东亚现代化： 新模式与 新经验

罗荣渠 董正华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

东亚现代化： 新模式与新经验

罗荣渠 董正华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罗荣渠、董正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罗荣渠主编)

ISBN 7-301-03107-6

I. 东… II. ①罗… ②董… III. 现代化-经济模式-研究-东亚 IV. F131

书 名：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

著作责任者：罗荣渠 董正华 编

责任编辑：刘 方

标准书号：ISBN 7-301-03107-6/C·111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45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一版 199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4.00 元

序 言

1994年11月7—10日,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学者,就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供借鉴的各种经验,展开了深入的学术讨论。这本论文集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要成果。

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的地区。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东亚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由盛而衰,再由衰而重新崛起。特别是在最近三十年中,以日本、四小龙、中国为主动力的发展巨流,勃然一跃而起,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可以说,东亚的现代化正在摸索新模式和创造新经验,它预示着东方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新方式。东亚的崛起,使战后西方主流派的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面临挑战。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力正在转向东亚,关注这个曾经被忽视或至少是被低估的重要地区。我们主办的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推动东亚现代化的综合研究而召开的。会议提倡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相结合,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总趋势、发展模式及其转换、发展的民族特色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整体比较研究和个案专题研究。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百花齐放,使会议富有成果。

要说明的是,这本论文集受到篇幅的限制,只收入了围绕会

议主题的各篇论文，而未收入全部论文。收入的论文均按原作者提交的稿子为据，译稿则力求忠实于原文。这些论文都不代表编者的观点或倾向性。但编辑加工如有不当之处，应由编者负责。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其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只是我们开展东亚现代化综合研究的良好开端。把这本论文集奉献给读者，是希望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个课题的共同重视，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以争取更大的成果和共同的提高。

这次会议的召开得到了国内外同仁的关注与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韩国研究中心和历史系的资助与协助，在此顺致谢意。

罗荣渠

1995年9月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目 录

审视东亚现代化的新思路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

- 新经验 罗荣渠 (1)
- 东亚: 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 [日本] 小林多加士 (32)
- 审视东亚现代化的当今观点 [日本] 若菜隆 (41)
- 现代化在东亚的地域推进 张 琢 (56)
- 东亚现代化的前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俞新天 (64)

东亚发展模式与新经验

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思考 巫宁耕 (80)

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人力资源战略:

泰国和东亚新兴

工业化国家 [美国] 弗里德里克·戴约 (88)

小农制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对台湾地区 and 韩国经济转型时期

农业制度的考察 董正华 (110)

日本、韩国 and 台湾农业发展的

一些启示 [比利时] 吴逸荃 (134)

台湾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管理	邓利娟 (149)
试析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行政体制	
因素	尹保云 (167)
马来西亚现代化与民族问题	丘立本 (191)
越南改革的理论思维与发展模式	
——中越改革开放的比较	梁志明 (212)

中、日、泰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日、泰三国	
改革与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王晓秋 (235)
日本与中国原工业化进程中市场条件的比较	
——以棉纺业生产为主要考察对象	严立贤 (250)
银行业在中日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虞和平 (277)
中日民间伦理与近代化之比较	
——对近代早期上海和长崎社会	
风尚的考察	李长莉 (289)
本书论文作者简介	(301)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

罗荣渠

一、对东亚历史转型期应进行再认识

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正在发生一个大转折，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政治上的大变化是战后建立的美苏对立的两极化的雅尔塔国际体制被打破，世界政治转向多极化格局；经济上的大变化是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趋于解体，东亚重新崛起形成欧洲北美以外的第二新兴工业带。

东亚，又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岛等；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再扩而大之，甚至可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国也包括在内。就东亚的重新崛起而言，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台湾、香港、东盟这个范围内，这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在人类古典诸文明中遥领风骚。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华夏文明（sinitic civilization）的农耕技术、帝国官僚体制、教育制度、儒教人文主义等等，都领先于西

亚和地中海文明。这一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商业资本主义渗入到东南亚的边缘区之前。十八世纪后期西欧工业革命使世界文明的罗盘针发生了重大转向：世界商路从大陆与近海转向远洋，使环北大西洋成为现代世界活动的中心区域；崭新的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兴起，而位于欧亚大陆最东端的华夏古典农业文明则转向沉沦。东亚被完全排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日本除外），而东亚世界自身也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大转变。在这个大的历史转型期，以西方为中心编织的世界史学把东亚界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词实际上是停滞、落后、专制主义、普遍奴隶制、东方家产制等的代名。^①由西方人设计的亚洲历史观，经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理论的敷陈，^②形成东亚社会的落后性与停滞性的历史定论。

但是，在最近仅仅一代人的世代中，东亚的巨变使世界的时针又开始重新转向。这指的是日本从战败国地位重新跃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东亚“四小龙”跨过殖民地时代在短期内跃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中国从“东亚病夫”一变而为东亚社会主义工业国，近年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取得持续高增长的巨大成就；东盟国家也已改变殖民地面貌，追踪“四小龙”进入准工业化进程。总之，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正以不同方式进入现代世界的发展大潮，它们的经济增长远远打破了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纪录。这就是引起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

东亚发生的巨变对国际社会科学提出新的挑战。不论是五十年代的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或七十年代的激进的依附理论，都不能对现实做出较满意的解释。近十年来，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新课题。^③

东亚人尤其需要对东亚进行再认识。应该说，近年来关于东

亚经济发展的单向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战后主流派的西方发展理论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单纯经济观点，忽视了后进现代化的启动是非经济因素重于经济因素；一是历史观点很薄弱，忽视地区性的悠久历史联系与文化资源。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现在有必要依据现代东亚的变化来重新探讨东亚近代史的框架，……有必要建立新的东亚的近现代史结构。这对从历史上把握现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④只有这样，即从历史、现状、理论的结合与整体关联的角度来看待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才可能获得有关东亚的历史、文明与发展趋势的正确图像。

二、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 三种基本演变形式

东亚大陆与其周边的东海与南海海域形成的多边联系网络，与西北欧及其周围海域的联系网络有些相似，但范围更加广阔。这样，就为东亚的区域性人口、技术、资本、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特殊有利条件，从而形成东亚世界的经济—文化互动链。在前现代时期，东亚的古典文明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而向东北亚与东南亚呈扇形展开的，因此以中国的儒教伦理为核心的政治模式、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汉字书写与印刷文化，都直接投射到中国周边的原始与半原始经济区，形成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以朝贡贸易与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东亚世界体系。^⑤这可称之为东亚“文化圈”，也可称之为东亚“经济圈”（或“经济世界”）。对比地中海文明而言，中国作为文化圈的中心胜过作为经济圈的中心。历史上的中国曾遭遇到多次的严峻的挑战，帝国体制多次经历衰落与分解而又一再修复并复兴，因而得以长期保持东亚世界的稳定格局，中心与边缘形成松散的从属关系。这与地中海世界的格局大不相同。可以肯定地说，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从很

早以来就已经分道扬镳，自成体系的东亚世界保持自己的独立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样长的历史连续性在世界各大文明圈中是绝无仅有的。

到十九世纪，以世界贸易—工业—基督教—科技文明为特征的现代西方崛起，形成并扩展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于是以农业—儒教文明为特征的东亚世界和以农商结合—伊斯兰教文明为特征的阿拉伯世界都急剧衰落。远洋贸易，世界市场，新兴工业，这三者打破了前现代和区域世界的自然平衡，把整个世界，从西方到东方，卷入一场大交易、大生产、大转变的运动之中——这就是世界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世界历史从分散的区域性的农业世界向联成一气的全球性的工业世界大转变。在近两个世纪中，一个以新兴欧洲与北美为中心而重新建构的、以世界市场为框架的现代世界体系就形成了。正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

不听任何人指挥的市场是整个经济的动力装置。欧洲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④

观察近代以来东亚的大变革，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之中。长期以来，东亚史的研究都是以国别进行的。对于十九世纪以前东亚发展的整体关联性至今研究不够，而对十九世纪以来东亚巨变的整体关联性就更少引人注意了。十九世纪是东亚历史的转折点。首先，英国占领新加坡（1819年）、马六甲（1824年）、香港（1842年），以一种全新的力量改变了东亚的进程。东亚的一体化被打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日本脱离了东亚体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越南、柬埔寨脱离了东亚体系。第一次中日战争后则台湾、朝鲜也相继被剥离；中华帝国随即解体，东亚的中心陷入半边缘化的境地。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入，使东亚被逐步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于是东亚才被卷入了世界巨变的大潮，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我把这一大转变过程分解为自身衰败化、边缘化与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个过程。^⑦这个多线性方向的矛盾运动在东亚各国大体上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基本演进类型。

1. 日本型：其特点是没有经历内部衰败并只受到很轻微的半边缘化，通过渐进的改革，直接进入工业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区域的新中心——资本主义中心。

2. 韩国型：其特点是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交织，最后完全沦为殖民地，经历殖民地型的畸形增长，通过革命化的独立运动，然后转入现代发展轨道，走上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3. 中国型：其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与帝国解体，但边缘化的程度不如第二类国家深重，通过革命化的重组过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以上三种类型之外，还有一些变形或混合型，如台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三大类型中只有第一种（日本型）是比较平稳的阶梯式推进。第二、三种都是极不平稳的断裂式推进。就是日本也因发动侵略战争失败而遭遇罕见的大波折。新加坡与香港都经过殖民地资本主义化阶段，属于城市型现代化的特殊案例。西欧的内源型现代化一般都没有出现过内部衰败化和边缘化，革命的层次也很浅（法国除外）。东亚的变革则具有边缘型现代化的新特征。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区别中心与边缘，不区别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热衷于推广统一的理想型模式，是既忽视历史又脱离本地区的实际的。

三、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

应持两点论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工业革命向整个欧洲与北美大陆大扩展，我们称之为世界现代化第二次浪潮期，同时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运动第二次大扩张期。到本世纪下半叶，又出现新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升级和全球扩展，我们称为世界现代化第三次浪潮。这样，东亚的变革可以明显地被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在第一阶段中，除日本以外，整个东亚都陷入边缘化和半边缘化的深渊。其中尤以日本与中国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日本迅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从东亚的边缘一跃而为东亚的新帝国中心；而中华帝国则不幸被迅速解体，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半殖民地。有关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而日本的“成功”尤为东亚研究的焦点。但必须指出，过去的这项研究都是采用西方现代化的范式、概念与“传统—现代”的两分框架。学者们对传统日本与传统西欧做过许多比较，诸如：日本的幕藩体制与西欧的等级君主制，日本的大名领国制与西欧的封建庄园制，日本的武士文化和町人文化与西方的贵族文化和市民文化，此外还有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身份制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相似之处。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都早已注意到日本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某些近似西方封建体制的特征。^⑥这些以西欧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对日本现代化的启动条件优于中国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在一个世代的短时间内就迅速实现西方国家用一两百年间完成的转变，从落后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俗话说：“后来居上”，日本是一个突出的

例子。日本也是唯一逃脱了沦入第三世界的非西方国家，唯一以平等的姿态跻身并分享西方建立的殖民世界利益的非西方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被认为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例外情况”。^⑨

怎样才能解释日本的“例外情况”呢？的确，日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特别是日本在德川时期出现的政治稳定、经济商品化与增长趋势，说明了当时日本内部确有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例外性”。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指出日本的外在“例外性”，那就是它处于十九世纪西方新兴工业化国家向东方进行殖民化推进的最远部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殖民化的中心地区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东北亚只受到浪潮前峰的撞击。日本抓住了这三十年的间隙推行了“富国强兵”的新路线，实质上是将国权运动与国富运动相结合，推行急速扩张型的现代化。中国也曾仿效过日本的维新变法，但由于中央皇权结构的衰败，即使要推行一点小修小补的“防御性现代化”也举步维艰，贻误了这三十年的有利时机。^⑩日本在尚未巩固天皇新体制下的统一之时，就把琉球与小笠原群岛纳入版图；在明治七年（1874）出兵远征台湾；在明治九年（1876）把西方式的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朝鲜，率先瓦解了中国在东亚的朝贡体系。明治二十七年（1894）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日本扮演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急先锋，其后果是打断了正在起步的台湾与朝鲜的现代化运动，并破坏了中国三十年“自强运动”惨淡经营的全部成果。日本的现代化的这种独特启动方式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从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作为现代化的成功的“楷模”时，均不约而同地只从经济发展角度讨论问题，^⑪而忽视日本明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特殊作用，这种片面的观点似乎至今尚很有影响，这对全面理解现代化的危害不浅。

日本明治时代的变革是完全以西方早期现代化为样板的。具

体地说，精心仿效英国君主立宪与普鲁士凯撒主义模式。但事实上日本效法英、德模式只是一个外壳。日本的新兴资本主义是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就内部结构而言，这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政权突出特征是统帅权的独立，专属于天皇。明治的绝对主义不同于西方绝对主义，具有现代军事扩张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特征。就外部而言，日本军国主义的早熟，“是由于中国成了欧美外来压迫的防壁，朝鲜避免了欧美的侵略，而日本得以代行其侵略等东亚的特殊条件而形成的”。^⑫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日本的所谓“脱亚”就是“夺亚”，所谓“兴亚”就是“侵亚”。^⑬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自戊戌维新效法日本变法失败以后走的是通过革命化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那么，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走的是通过海外扩张迈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日本的现代化的高速推进是以牺牲东亚其余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为代价的。整个东亚的资源、市场、人力和物力支持了日本造成它的新东洋帝国。日本崛起对此后半个世纪东亚历史进程造成的严峻形势，是当时任何西方国家都做不到的。

明治现代化的成功是西洋技术与大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成功。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保护和鼓励，对外国资本的限制与排斥，用丰富而低廉的人力资源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起军事化的工业体系，并迅速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而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并没有转好，国权压制了民权，新兴的自由民权运动半途而废。这种半截子的现代化把日本导向军国主义—霸权主义发展轨道。在这一急剧转变的过程中，连追求西方价值观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从民权主义的倡导者变为国权主义的吹鼓手，甚至为日本军国主义捐献军费，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而感动得涕泪纵横。十九世纪后期东亚各国都欣赏日本的崛起，都曾想效法日本的维新模式，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而这一模式也是不应效法的。

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都把日本早期现代化的出色表现首先归之于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善于学习与摄取外来文化。这种解释是以“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和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评估的基准。在今天，应在对现代化再认识基础上，对日本明治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进行全面的历史审视，做出“两点论”的新估价。在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在1938年曾用英文发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深刻见解，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胡适认为：日本式的现代化处在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它是有秩序的、精打细算的、连续性的、稳定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但他指出：

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⑭

胡适在这篇不曾被人注意的文章中预言日本现代化的外壳中包藏的危险物果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不仅炸毁东亚各国现代化初步建树，最后也炸毁了日本早期现代化的成果。日本学者也指出：明治时期提倡西方技术与日本方法相结合，而拒绝了西方的精神特质，结果给国家带来了1945年的灾难。^⑮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还值得深入探讨。

明治维新在“富国强兵”路线下进行的“置产兴业”的现代化，只具有西式现代化的外形，而包含了武士道现代化的内核。在这里，传统与现代性在大转变过程中的互动作用，比西方早期现代化要复杂得多，具有更多的东方特色。如何促进传统与现代化

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避免和限制它们之间的恶性互动，这是应加以总结的一个重要经验。

日本明治维新启动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最终被错误的导向引向断裂（breakdown）。由于错误至深，以致难以自上而下地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自下而上的革命发动或外力的干预，进行第二次现代化。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所走的道路。中国自自强运动失败以后造成现代化的危机，于是，出现了一次又一次自下而上的发动，走上了通过革命化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最后是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断裂，但也造成中国现代化模式大转换的契机。这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新问题。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在东亚的崛起，也使战前的东亚出现两种类型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一种是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台湾、东三省等处出现的完全从属于宗主国的畸形殖民地资本主义化；一种是美、英势力在中国及东南亚造成的另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这些情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某种连带关系。但这是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⑩

四、战后东亚发展的内外 因素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战前东亚现代化只有日本一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且尚不是完全的成功，那么战后东亚现代化则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仅在一代人时间内就有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首先，中国大陆在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并转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建设时期。日本则因“韩战特需”而脱离了战后重建阶段，从五十年代后半期正式进入安定增长，经济开始重新“起飞”。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统称东亚“四小”）都是六十